

青年读本

肖音题



人贵自知

(上)

钱歌川 著

钱歌川(1903-1990)原名慕祖,自号苦瓜散人,又号次逃,笔名歌川、味橄、秦戈船。著名散文家、翻译家、语言学家、文学家。湖南湘潭人。1990年病逝于纽约。

大众文艺出版社

青年读本

黄方道题



人贵自知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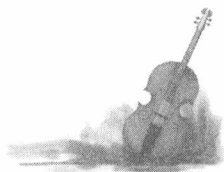
RENGUIZIZHI

钱歌川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佳茗余谈	350
名山事业	352
谈话的艺术	355
语文的作用	359
外行人的成就	363
思想为做人之本	366
致有志于科学的青年	369



回忆郁达夫

遇害四十周年纪念

我在日本留学期间，因读的学校不同，加上我又是一个不爱社交的人，我从来没有遇见过郁达夫。他在日本是学经济的，学名郁文。隔行如隔山，我更见不到他的项背了。

创造社初期的几员大将，我只认识成仿吾。他是学造兵器的，学名成灏。我也不和他同行，为什么会认识他的呢？因为他是我二哥的好朋友，又是湖南同乡，他们都是学工科的，趣味相投，很谈得来。成常来找我二哥扯谈，我和二哥同居一室，奉陪末座，无可避免，不过我当然只有恭听的份儿。

1921年由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发起，成创造社，后来回到上海发行《创造》季刊，又出版《创造丛书》，一时颇为风靡。《创造》季刊是1922年5月在上海创刊的，到1924年1月停刊。1923年秋，我和几个留日同学，因日本大地震不能返校，便到西湖租了玛瑙寺的房间住下，每日游山玩水，闲聊郁达夫的小说。我在1926年回国，郭沫若著的《灸神》、郁达夫著的《沉沦》，成了全国青年人手一篇的读物，他们都相当有名气了。

我在20年代末期，进入上海中华书局编辑部，30年代初文人都有接触，时常聚会，以资联欢。骨子里的目的就是拉稿。长稿出书，短稿给杂志用。

创造社后期的冯乃超，在日本时就很友善，常用笔名在我编的杂志上发表文章，稿费虽不太丰，有时也能救急。还有创造社的诗人穆木天，也是我家的常客。

那时郁达夫住在民厚里，离我居处很近，我常去拜访他，意图当然是拉稿。他倒是有求必应的，我记得他给我的第一篇稿子，是题名《瓢儿和尚》的短篇小说，1933年1月10日登在《新中华》创刊号上。后来他还写有什么



记齐白石

北平有一画师，与姜白石同名而异姓——诶，你不要听错了，我是说他们同名，并不是说他们齐名。当然喽，一个生在宋朝，一个生在现代，一个是词人，一个是画师，他们的大名又怎样可以齐呢？我们这位画师，古怪得厉害，他就在现代的名画师中，也决不会与谁齐名，你说他齐姓，那倒可以，因为他本来姓齐。

齐白石，名璜，湖南湘潭人，多年侨居北平。他虽然是一个龙钟老者，却曾由徐悲鸿的劝驾，到国立艺术院那样一个洋学堂里教过书，不是教过画。所以你不要把他当作老古董看待，他却有不少穿西装的高足呢。

我因为是和他同生在一个城池里的关系，从不认识字的儿童时代就知道他，但我并不晓得他就是鼎鼎大名的齐白石，也不晓得齐璜就是他。我只晓得他叫做齐木匠。（这是他自己也引以自矜的，他为我画的一幅水墨画上，就盖着一颗“老木”的章子呢。）没有看见齐木匠造的房子，而只看见齐木匠画的画，这是一个幼小无知的灵魂，常常觉得奇怪的。后来我在他的画上面，找到了一些房子才得了一个解释，原来他是专造茅亭的。他画的那些样子，都是在乡下，我是一个生长在城里的孩子，当然看不见他画本的实物。我每回到亲戚家里去，就看见他画的一张茅亭。亭子上面有一匹黄牛，我总提心那黄牛有天会踏下把亭子踏破。

中学还没有毕业，我就离开了故乡，几乎一直到现在都在外面过日子。这些时候因为学的东西不同，竟再没有机会谈到那个伟大的木匠或谈他的画了。去年我到北平去，无意中听到一位朋友谈起他，于是重新唤醒了我二十年前的记忆，我觉得我们乡下既产生了这样一位独创的艺术家，小时我没有见到他的机会，现在既近在咫尺，怎样可以不去拜访他一次呢？我的朋友看透了我这种心思，不待我提议，他便说可以带我去看看他，也许他高兴还可以给我画一张画呢。



三年之间，因为民国四年我又跟随父母到靖县去了。民国五年一月一日袁世凯称帝的时候，我父亲正在靖县知事任内，我在那儿读中学，年龄也不算小了，所以对于那不到三个月的洪宪朝代，以及那以后共和再造的情形，都记得很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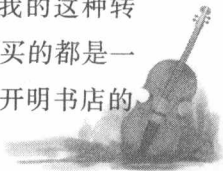
我没有进过明德中学，原因是我不愿离开家，老是跟随父母在湖南各地跑着，湘资沅澧四水都跑到了。父亲到哪儿做事，我就跟到哪儿，进当地的中学，一直进到十七岁负笈东渡为止。最后进的一个中学，是益阳桃花峯的信义中学。一位挪威人教我们的英文，把礼拜三念成“威得内斯代”，我觉得很好笑，因为我过去在长沙跟英国人学过一两年英文，现在到乡下来，自然比一般的好多了。

我到日本去了六七年，这期间与靖师没有见过一面，也没有函札往还，几乎把他老人家淡忘了，然而靖师对我却一直是关心着的。何以见得呢？因为我在民国十五年冬从日本高等师范毕业归来，住在长沙马王街。教育界第一个来找我的人，就是靖师，可见他对于学生们的行踪，随时都在密切地注意着呢。

我那时刚从外国回来，也是刚从学校出来，一点教书的经验也没有，靖师却怀着一张聘书和六十元大洋一个月的束脩，亲自枉驾来聘我回母校去教书。我当然不加考虑地就应命了。这便是我粉笔生涯的开端。从这以后十余年中，直到靖师民国二十九年于渝病故为止，我都一直未尝和靖师失去联系，除了在我赴欧的三年间以外。

当我回到长沙的时候，与我同负笈日本的同乡学长也先后都回来了。就在那个时候，明德的老学长，也是东京高师同年毕业的周芳冈兄，发表了古稻田省立二中的校长，另一位高师同年毕业的吴建中兄，也发表了书院坪省立一中的校长，他们都要我去帮忙，我只好都答应下来。后来还兼了兑泽和衡粹的课，除在五所中学教书外，又在省政府教育厅兼职，我真不懂得当时为什么有那样充沛的精力，也许是刚出大学校门的原故吧。

我对于文学的爱好和野心，驱使着我走向大地方去谋发展，到了民国十九年我获得了靖师的谅解，辞去明德等校的教职，前往上海鬻文。我的这种转变，也并不是突如其来的，在日本留学的时代，早已醉心于诗文，买的都是一些文学书籍，自己也常练习写作。第一篇发表出来的作品是刊载在开明书店的



追忆徐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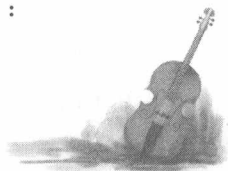
在30年代初期，我在上海主编《新中华》的时候，徐訏和陶亢德也正在那里，为林语堂主编《论语》，提倡幽默。同属于上海文化界的朋友，当然不但是相识而已。那时同在一个文化圈子内，除了鸳鸯蝴蝶派以外，其余不问左派、右派、现代派、象征派、留美派、留日派、新月派、古典派，都各显神通，舞弄笔墨，也常有聚会，毫无敌意存乎其间。思想前进的，译介一些苏联的小说，如《铁流》之类；思想保守的，就译介19世纪的世界名著。因为出版家的背景不同，出版的书才有左右之别。我在30年代初期也译介过一部苏联作家爱伦堡的小说，书已由中华书局印了出来，但检查没有通过，竟未及发行就全部销毁了。不过左派的人用笔名在我主编的杂志上投稿，以获得一些稿费救急，倒是常有的事。冯乃超、穆木天那些创造社的朋友，也是我家的常客。比较右倾的文人，交往当然更多了。

我和徐訏有进一步的交情，是从同船赴欧时开始的。1936年的秋天，我带了十年的积蓄，从上海登上了意大利的快轮康铁佛田号，便放洋赴欧了。我们坐的舱位，美其名曰经济二等，实际就是三等，两人一个房间，每日三餐吃的不坏，而且每餐都有水果，也算是开洋荤吧。船上除一两个印度人外，都是中国人。头等舱中是不是有西方人，就不知道了。陈济棠是坐头等舱的，我在金字塔前的骆驼背上看到了他，另外也没有看到一个碧眼儿。

开船以后我在船上只遇到一个熟人，那就是徐訏。我在动身前仿佛听说他也计划出国，但未料他会和我同船。在甲板上遇到了他，真是喜出望外。

我在出国之前早预备好一本手册，是准备请同舟共济的朋友，每个人为我题上几句，作为日后回忆的张本。为我题写手册的，徐訏当然是第一人。他是小说家又是诗人，提起笔来略加思索，便写出下面这样一首诗来了：

我知道你聪明人什么都会晓得，



港的刊物撰稿。至于与香港的朋友通信，台湾倒并不禁止，可能他们是要检查的。我虽知道徐訏的行踪和地址，但始终没有和他通信，直到我来美四年后的1976年夏，才因为受了一个友人的嘱托，写了一封信给他。他马上回了我的信。下面就是他的来信：

歌川吾兄：

多年不见，正收到开明书店出的大作《客边琐话》，忽见手教，欣慰奚似。

汪××先生是我新亚书院同事，相识已久，承推荐为感。不过浸会中文系，六七年来人事迄未变动，故难有空缺。且私立大学，经济预算甚紧，亦无法加添新人。闻台湾文化学院吸收退休学人甚多，何不向那边进行之。

兄退休寓美，定多佳胜。弟于1966年曾到美开会，匆匆已是十年。回忆我们同船赴欧之日，真有隔世之感矣。

忙中勿复，容后再详。暇请时赐教言。暑假已届，弟拟于6月初旬到台湾小住。专此即请文安。

弟徐訏顿首5月29日

近与友人办七艺月刊，定7月份出版，兄有暇请惠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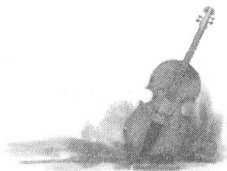
宏文，以光篇幅，毋任感幸。来示以后可寄：

Hsu Yu

G. P. O. Box. 13441

Hong Kong

这封信是他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书，不但以后我们再没有函札往来，而且过不了几年，他就溘然长逝了。



极为不易，以后也就和他断绝联系了。

胜利后我回南京，又去日本，过了一年便前往台湾。因为不知道重哑的住址，一直少通讯问。我在台湾住了十七年后，才得到机会出来，到新加坡去教书。又过了五六年，重哑到新加坡来游览，才得久别重逢。我为他设宴，介绍新加坡文化界的人士和他见面。

他告知我说 50 年代初期，他就离英渡美了。初任麻州波士顿附近塞伦港的比巴地博物馆有关中国民族学方面的职务，到 1955 年便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讲授中国书画雕刻和东亚语言文化，一直教了十六年，到 1971 年退休。那以后没有职务上的羁绊，他便得自由自在地到处游历，去了日本，又去了澳洲，所到之处，都要细心观察，搜集写作资料。比方他到新加坡不久，就发现了好几座齐天大圣庙，笑我深居简出不知道新加坡的奥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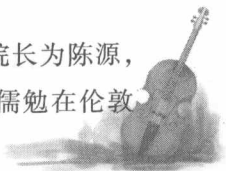
他流寓海外四十年，写了二十五部自己插图的书。第一部书叫做《中国人的字画鉴赏》，接着是《中国的书法》，后来主要撰写各地的游记，书名为《哑行者在牛津》（中文名《牛津画记》）。用一个外国人的眼光，来看西方的风景和人物，附有各种各样的素描和水彩画图，引起读者阅读的兴趣。这套书在出版之初，甚至还惹起治安当局的注意，认为一个一声不响的独行者，到处在细心观察，是不是在做侦探的工作呢。

1975 年 4 月，他在去国四十二年之后，重返家园，回美后发表了一部《重返中国》，封面是他自己的画“江山如此多娇”图。1977 年 8 月他再度回国，到 10 月间他的肠癌旧病复发，已扩散到肝和肺的方面，终至不治，10 月 17 日在北京去世。25 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追悼会，吊者有许德珩，吴有训，严济慈等多人。

我 1972 年底由新加坡退休来美，与蒋彝虽同住在纽约市达五年之久，但因交通关系不能朝夕过从，见面的次数不多，未料他才活了七十四岁就匆匆地加入了古人的行列，魂归故土，永无再见之期了。

我的两个同庚好友，一个是美籍的蒋彝，一个是英籍的王云槐。我则不英不美，至今还保留中国人的身份，而且比他们活得更为长久。

1939 年我受聘到武汉大学去教书，那时校长是王星拱，文学院院长为陈源，外文系主任是方重。李儒勉和王云槐都是武大的老资格教授了。儒勉在伦敦



时，和我最相契，云槐却是最近才相识的。我们三人很谈得来，因鉴于没有一本适用的大一英文课本，三人同意合力来新编一本，由我寄去上海中华书局尽速印出寄川应用。那时上海虽早经沦陷，但航空邮件，畅通无阻。我们选材和注释，日夜不停地赶工，很快就完成，上海中华书局也很帮忙，在新学年开始时书已寄到了。

初未料这样一件小事，竟引起了系主任的不满，云槐去了重庆，参加英国新闻处的工作，我也另接了四川大学之聘，相继离开了武大。后来云槐力邀我去帮忙，我便辞退峨眉（川大所在地）而就重庆，为他们主编一个名叫《世说》的周刊。后来儒勉也来加入我们的阵容，为新闻处主编一个英文半月刊。

击败日本是我们同盟国家共同的目标，所以不以替洋人服务为耻，何况那时洋机关的待遇远高出我们教授的薪水，别说学校当局下令逐客，即令殷勤慰留，恐怕也留不住呢！有次陈通伯和杨端六到重庆来，我请他们上馆子餐叙，他们也感觉到我那时是可扰之东吧。

在英国新闻处的那几年，早晚都和云槐在一起，比在武大时更为接近，而交情也因此而更加深笃，直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大家复员。我和云槐，也劳燕分飞，各奔前程。我短期到日本，又长期去了台湾，听说云槐在香港办报，但台湾封锁政策，使我们与外界隔绝，虽一家人父母子女也不许通信。直到1964年我才得脱出樊笼，飞向自由天地的新加坡。在那里待了七八年之后，云槐夫妇由伦敦来新加坡探亲（儿子在新加坡英国大使馆工作，云槐夫妇和他们的独子，早已入了英籍，在伦敦备屋定居了），这时他们探听到我在新加坡大学教书，才由他儿子打电话和我联络上了。我们一别近三十年，意外地在新加坡重逢，有如隔世，彼此快慰，可想而知。我要不到新加坡，便再也见不到他了。人生聚散，似乎也有缘分，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

云槐在新加坡小住了一阵子，又回到伦敦去了。他是一个不爱写信的人，我们只在年终交换一张贺年片。我从新加坡七十岁退休来美，也还和他交换过两三次贺片，以后再写卡片就接不到伦敦的复片了。我离开新加坡时就听说他患上了癌症，所以断定他不回信就是死别已吞声了。真是古诗说的“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呀。

走笔至此，徒感生死茫茫，凄凉满腹，缀以小诗寄意：



回梦六十年

纪念章锡琛先生百年冥诞

章锡琛先生创办开明书店，我是第一个赞助的人。这样说并不是我妄自夸口，而是有真凭实据的。因为我拿到的是开明书店股份有限公司天字第一号印的股票。

开明书店正式成立是在1926年。而早在1923年的夏天，我由日本回国省亲，路过上海，短期逗留，观光访友。那时章锡琛先生刚有创办书店的构想，不免要和一些文艺界的朋友商谈筹划。当时上海一些有理想有抱负的文人学者，在江湾创办了一个立达学园，以培育新进，发展天才。很多文艺界的朋友，如朱光潜、叶圣陶、丰子恺等人都荟萃在那里。我到上海不久，也前往江湾立达学园拜望丰子恺，并聆听他们办学理想，和目下的成就。

章锡琛先生原是在商务印书馆编辑杂志的，他离开商务以后便自己创刊了一个杂志，定名为《一般》，后来改名为《中学生》，以显示开明书店出版书物的重点所在。我去看子恺时，《一般》月刊才问世不久。记得子恺曾郑重地对我说，杂志和书店两方面，都希望我能帮忙。我自知能力薄弱，但好像当仁不让似的，也就满口答应了。不但当时答应，而且以后也都兑现了。杂志我投了稿，书店我投了资。

这儿所说的帮忙，到头来却成为互助了。子恺要我在杂志和书店两方面都帮忙，后来竟变成了不是我帮他们的忙，而是他们都帮了我的忙，而且帮了我的大忙，只是在当时我一点也没有意识到罢了。

《一般》杂志我虽只投过一次稿，但对我一生的影响却是很大的。试想一个还在校读书的学生，初次写的一篇不成熟的作品，居然能在上海正式的刊物上发表，这对他的鼓励是何等的大呀。我投稿的当时，对编者的采用是不敢存



太多的奢望的，所以不愿署上作者的本名，而临时从日本的报纸上拾取了一个日本的姓氏作为笔名。文章发表了，患不到这个信手拈来的名字竟成了我的注册商标，以后继续发表文章，和出版书籍，也都沿用了这个笔名，而本名也就再没有机会使用了。

我在开明书店入股的金额，不过五百块大洋而已。这时公司的整个资金来说，真是戈壁之数，微不足道。但它对我的效用，却是很大的。由于这点渊源，我在开明书店出版了好几本书，博取虚名事小，预支到相当多的版税，对我当时初出茅庐的处境来说，帮助之大，无以复加。

1926年冬，我从日本毕业回国，在家乡的几个中学任教，虽然收入不恶，可保丰衣足食，但我内心时时不忘向文学界进军的愿望，且不愿老守着乡里做一辈子教书匠。终于在1928年，我毅然决然辞去了家乡的教职，向全国文化中心的上海讲发了。

所谓十里洋场的上海，正同友人说的，米珠薪桂，大不易居。我初去人地生疏，一筹莫展，幸赖新成立的开明书店章锡琛、夏丏尊、丰子恺诸位先生大力支援，方得渡过难关，步入坦途。初期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们预付稿费给我，使我得以维持起码的生活。过了一年多奋斗的岁月以后，又由开明书店总编辑夏丏尊的介绍，我得进入中华书局编辑所去任新文学编辑，从此有了固定的收入，可算是在上海站稳了脚，尤其是进入了文化界实现了生平的风愿。

这样一来我所接触的都是文人，大都是新文化方面的作家，不但我办的刊物要请他们撰稿，而他们办的刊物，也来向我征文。其他上海滩上的出版家，如北新书局，神州国光社，也邀我撰写英文的或中文的书稿或译作，当然我主要的作品，在情理上就得交由中华书局出版。我白天在书局办公七小时，晚上就得在家写作或翻译，以获得定薪以外的收入。

我每想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我前半生的事业，求本索源，都是由章锡琛先生的开明书店培育而成。如果没有开明，我可能就进不了文化界，更不要说毕生从事文笔生涯了。试想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卒，要想在上海大刊物上投稿或大书局中出书真是谈何容易！即令你自认为小有才，也不见得能获得编辑的青睐。叶圣陶在《小说月报》采用了巴金的投稿，使他至今感激。开明章锡琛先生当时对我这个后辈的提携，我又如何能不感戴不忘呢。



比之上海这种被动的方式，苏州的酒馆确是代天行道了。我尝薄游吴门，看见有些酒馆门口悬着一块红牌，上面写着一个大“天”字。初见时当然不懂为什么缘故，后来问了地方上的人，才晓得那是表示有残羹剩饭要施舍给穷人的意思。

我每想到这件事，就觉得那个“天”字，太有意思了。这无异一句不脛而走的标语：你们靠“天”吃饭的人，赶快来呀！这儿有酒肉！

这种人，我已经说过，是有天可靠不患会饿死的。他们知道人命关天，要死也不是一回容易的事。他们又知道富贵在天，所以并不用去努力做什么事业，如果真的运气来了，他们可以一步登天。去谋有什么用呢，人尽管去谋，成事却在天呀！

以前的女子嫁了一个丈夫，一切都受着他的支配，可以说她的命运全握在他的手里，正同我们一般人的命运全靠天定一样，所以女人的天，即所谓“所天”，便是她的丈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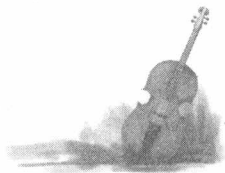
丈夫为什么可以做定命的天呢？因为在男性中心的社会里，一切的大权全握在男子手里，所以男子便是天了。虽然这个天是人力造成的。

然而中国人却不承认这是人力。中国人只承认人是无能的。有能力的只有天。大至于国家的兴亡，小至于个人的贫富，一切自有天定，人力不能赞一辞。分明是敌人的兵力把我们战败了，我们不承认是自己的过失，而偏要说是天意。

败者既是天降的祸，胜者自然也是天赐的福，那些恃强得胜的人，因此便自称起天子来。相信自己是天之骄子，可以任意妄为，于是乎无恶不作，而人民莫可如之何。他为什么敢这样大胆作恶呢？他所恃的是什么呢？这不外乎是天。人民对于他敢轻而不敢侮，敢怒而不敢言，也仍不外乎是天。因为天不能言，所以它是恶人作恶时的护符，同时又是善人被欺时的慰藉。

“作恶者让他去作罢。等他恶贯满盈的时候，自然要遭天谴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便是中国人的天命论。

天命论者到了现在，对于内忧之频仍，只好连呼“天晓得！”而对于外患之日亟，也只是袖着手低叹一声：“天丧予！”



《诗小雅·鹿鸣》上说：“鼓瑟吹笙。”笙是用十三支竹管，列置瓠中，管底装簧，吹时发出声音，可以奏乐。

中国民间最普通的乐器就是笛，古代称为篴，是横吹的，长一尺六寸，围二寸二分，上开一大窍，径三分半，离三寸二分处开第一孔，余孔都是相距五分，除吹窍外，共开六孔。据传是黄帝命令创造的。马融写《长笛赋》，又说出自羌中，所以又有羌笛的名称，唐诗云：“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王羲之《兰亭修禊序》上说的，“虽无丝竹管弦之盛”，是说当时没有奏乐。乐器中笙箫之类都用管，琴瑟之类都用弦，所以用管弦作为乐器的通称，据蔡邕的《月令章句》上说，“管者形长围寸，有孔无底，其器今亡。”古时还分孤竹之管，孙竹之管，阴竹之管，形制如何都不得而知了。诗《小雅·何人斯》中说的“伯氏吹埙，仲氏吹篴”的篴，也是管的一种，早已失传。

还有一种现也失传了的乐器，名叫箜篌，汉武帝命乐人侯调造箜篌，其器礼曲而长，二十三弦，抱在怀中用双手齐奏。古筝五弦，是竹制的，到秦朝时蒙恬把它改为十二弦，并以木代竹，唐以后又加一弦，今天我们所见到的箏便是十三弦了。

苏东坡在《赤壁赋》上说，“客有吹洞箫者”，所谓洞箫是单管直吹的无底的箫，即今天我们所常见的那种竖笛。汉元帝多才艺，善吹洞箫。汉以前的古乐中所说的箫是排箫，大的有二十三管，长尺四寸，小的也有十六管，长尺二寸，排箫上端平齐可吹，下端两旁长而中央短，参差不齐，各管的底都用蜡密封紧。有时那上面漆有云彩，所以又称云箫。另有一种三孔而短小的笛子，名叫龠。《诗·邶风简兮》上说：左手执龠，是可以执着来舞蹈的。

以上是说古代用竹制的乐器，真是洋洋大观了。记史用竹，奏乐用竹，为什么古人这样器重竹子呢？第一，它是岁寒三友之一，能够抗严寒，经霜不死。其次，是如古人所说的，“竹本虚心是我师”。虚心才有进益，是求学的基本条件。再次，竹有节，是一种美德，所谓高风亮节，是做人的标准。

竹的表现如此高尚，而它的实用价值，更非任何植物所能比拟的。汉时有用竹做的“竹官”，老百姓住竹屋，竹篱茅舍，正是中国的农村景象。



在月中甫出版的第一九六期《今日世界》上，登有一篇《自由中国公务员的疾病保险》一文。我因小贩送上门来兜售，买了一本，随手翻阅，就看到这篇附有插图的两页长的报导。一口气读完之后，感觉到这确是自由中国的一大德政。任何公务员参加保险以后，每月只要缴纳少数的保险费，随时发生疾病，都可享受到免费治疗。

这项公务员保险办法，是前年八月开始实施的。它的主管机关是铨叙部，承办业务的单位是中央信托局。特约负责医疗的机构，自国立台湾大学附属医院起，已约定有六十七处，其中私立医院不过七处，其余都是公立的。

在伤病医疗方面，可免费诊断及治疗内科、胸腔内科、肠胃科、精神病科各种病症，但不包括非积极治疗及门诊用的维生素，荷尔蒙类药品，及非急救必需的输血。外科可以行开刀的大手术，但不包括配义肢、义眼、义齿、验光配镜、整容整形，及非因疾病而施行违反生理的手术。

公务员因待遇菲薄，要维持一家生活已感不易，遇到生病，常无钱就医，有了免费治疗，自然受惠不浅。我台南有位朋友得了癌症，就是在公务员保险制度之下，在台大医院去施行手术的。他告诉我幸亏有这种保险的免费医疗，不然，一万多元的开刀及医疗的费用，他自己绝负担不起的。他今天能康复照常办公，不能不感谢这种保险制度。他不过是全省十七万公务员中的一个，当然不见得人人生病，不过对于患病的人，这帮助实在太大了。这种制度是值得赞扬的。社会上任何人，尤其是公务员本身，都应加以爱护，合作支持，决不可因为一己的私利，而去破坏它。为大公的正道，为大家的公益，无论病人或非病人，都应共同来维护这一种善良的制度，以发挥大公无私的精神，而为人群众造福。

不意人们的劣根性无孔不入，一个自私的心随时在作祟，现在又对这种善良的制度，在施以严重的威胁了。自从保险制度实施以来，到现在不过一年半光景，到今年三月底为止，仅是免费医疗部分，就已用去了新台币七千一百余万元之多，不但把疾病现金给付部分的准备金，全部挪用，而且还亏损了一千余万元。谁也知道这么重的负担，是不能长久支持的，听说立法院方面已经在进行修改公务员保险的条例了。

想把这种制度拖垮的私心，是用下面几种方式表现出来的。传闻有些医院



里见到公保的病人一切费用开价都比普通病人要贵上一倍光景，普通二三元的药，总要开五六元。不包括在公保内的维生素或荷尔蒙，有时也在别的药名下发出来，受诊的人与诊治方面似乎在狼狈为奸，来向公保敲诈。而有些公务员不了解公保的意义，总以为不要自己花钱，应当像用公家笔墨纸张一样，不妨多多浪费。有人明明病已痊愈，还占住病床不肯出院。有此诊一次已好了的小毛病，也要天天去取药，取些西洋补药来吃。甚至还有冒名顶替的事发生。为着个人的私利，竟不惜使公保医疗产生漏卮，蒙受亏损，终将不能照旧维持下去，而使后来真正患病的人，失去免费就医的机会。

因为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常使一个很好的制度，被人利用肥私，而将之破坏无遗，实在可惜。社会假公济私的人太多，变相贪污层出不穷，国民道德日益低落，国家民族日益危殆。提倡礼义廉耻，讲究道德重整，乃至创立孔孟学会，如果只言而不行，又能收什么效果呢？这一切都很冠冕堂皇，作为表面文章极为美观，若以实用价值而论，还不如“去私”二字。人们要能做到去私，或相当的去私，就一切都可以好转了。

